

劉明修與《李登輝傳》的書寫史研究^{*}

任育德^{**}

摘 要

劉明修（1937-2006）撰寫的《李登輝傳》，在「李登輝學」的建構中具有先導意義。本文從學術及回顧角度分析《李登輝傳》的書寫史及人物所處時代意義。書籍作者劉明修有走出書齋參與海外臺灣人活動、發表言論，傳播理念的特性，《李登輝傳》可視為相關成果之一。劉明修架構在個人前作通史性《台灣》基礎，描述臺灣民主化進程，特別指出臺灣蔣氏父子威權統治的本質對臺灣人權造成傷害，臺灣民主是臺灣人在因應國際局勢變化下，辛苦爭取而得。劉明修透過《李登輝傳》鋪陳描述的主題就是，李登輝身為臺灣人總統，要如何進入國民黨統治體制出頭，在蔣經國去世後化解保守勢力抵抗，鞏固權力基礎，建立並帶動臺灣民主體制發展，從被治者轉變為統治者，在臺灣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李登輝傳》在文獻蒐集、內容論斷、人際關係觀察，均成為後繼研究者必須參照的基礎，但受限當時史料開放、蒐集度，也有未能掌握之處。本文即就此舉例研究，以期理解李登輝在初入政壇時開始學習參與外交工作，所帶給他的實際影響，為他在1990年代以外交出訪、推動務實外交建立基礎，作為現有研究之擴充。

關鍵詞：劉明修（伊藤潔）、李登輝、李登輝學、臺灣民主化

^{*} 本文為作者個人學術意見，不代表機構立場。

^{**}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壹、前言

2020年，李登輝（1923-2020）過世。臺灣出版界在2021年正式出現以「李登輝學」標題專書，從人民觀感、專家討論、學術書寫等不同方式開展李登輝與時代記憶的書寫。¹若從身兼時代見證者及比較政治研究者雙重身分林佳龍的角度言，「李登輝學」之形成，一是在臺灣處在政治轉型動盪時期，能成功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高度發展；二是同時期東亞臺灣、韓國均步向民主鞏固階段，卻只有總統李登輝獲得國際社會稱之「民主先生」，具有重大時代意義。²換言之，李登輝與身處的臺灣政治轉型時代、周圍人物活動本身都是當代歷史研究的課題之一。如此，則書寫李登輝經歷相關傳記，就是「李登輝學」的人物研究素材之一，要追溯「李登輝學」相關書籍產生歷史，1996年在日本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李登輝伝》，³勾劃李登輝半生活動，運用相關史料、新聞、公報、李登輝友人訪談附上內文簡註，是第一本用學術性手法書寫的日文李登輝傳記，也就該予以一定評價，並且將之視為「李登輝學」相關構成文本基礎之一。《李登輝伝》作者是出身臺灣宜蘭、歸化日本的劉明修（1937-2006，日本姓名伊藤潔），行文時統一使用劉明修。

劉明修《李登輝伝》1996年出版後，有關李登輝訪談（包括接受他人採訪側寫、史政機關口述訪談）、從臺灣民族認同主題路徑書寫李登輝生平作品相繼出現。李登輝把握當事人話語權，暢談個人治國理念、理想願景，總統在任期間出版《經營大臺灣》（1999）；卸任總統後，出版副總統期間和總統蔣經國（1910-1988）談話相關筆記（2004），也接受史政機關口述訪

¹ 林佳龍總策畫，董思齊主編，臺灣智庫、李登輝基金會統籌，《李登輝學X學李登輝：民主臺灣的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臺北：釀出版，2021年）。

² 林佳龍，〈李登輝學與臺灣時代課題〉（2021年7月30日），收錄於「自由時報」：<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463747>（2023/11/10點閱）。

³ 伊藤潔，《李登輝伝》（東京：株式會社文藝春秋，1996年）。文藝春秋社創設於1923年（大正12年）1月，創辦人為作家菊池寛。1946年3月，文藝春秋社因參與「戰爭協力」而遭到解散。6月，由佐佐木茂索等原文藝春秋社的社員組建新社。1966年更名為株式會社文藝春秋。旗下有綜合性雜誌及文學出版。至2023年已創設滿一百年。相關說明見「文藝春秋」：<https://www.bunshun.co.jp/>（2023/08/01點閱）。

問並出版訪談紀錄（2008），會主動釋放訊息，以塑造人物形象。⁴ 歷史研究者面對這樣的人物主角、主動提供研究素材，以及開放自由的研究環境，向下推伸研究時段即屬自然。我們在人物史研究中，已可見到透過研究角度回顧「李登輝學」發展與建立之成果；但是，如果追溯「李登輝學」架構相關著作之產生，至今尚未見到與研究史相關之《李登輝傳》是如何產生、及其書寫意義之研究出現。直到2023年，始有以學術方法探討《李登輝傳》作者劉明修與臺灣歷史記憶型塑主題論文問世。⁵ 這就給予研究者研究學術發展史的空間及機會。

本文即環繞「李登輝學」基礎作品之一——《李登輝傳》的撰寫為主題，探討個案書籍的時代意義。該書作者劉明修是以海外臺灣人角度，書寫第一位臺灣人總統將國家帶領步上民主鞏固之路，反映個人理想投射、群體心聲。本文以為，劉明修《李登輝傳》的書寫方式，是想讓臺灣的東亞近鄰日本更能瞭解當下臺灣現況發展，以促進相互理解。同時，本文透過近年開放史料，以個案分析，在李登輝政治經驗養成過程中，仍有可進行探討的課題。

⁴ 後續出版他人觀察，如徐淵濤，《替李登輝卸妝》（臺北：徐淵濤，2000年）；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記錄整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編輯製作，《戴國輝全集18【採訪與對談卷一】》（臺北：文訊雜誌社，2011年）。採訪李登輝，如上坂冬子，駱文森、楊明珠翻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臺北：先覺出版社，2001年）〔日文版：上坂冬子，《虎口の總統 李登輝とその妻》（東京：講談社，2001年）〕、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臺北：印刻文化，2001年）。史政機構口述訪談包括：李登輝原著口述，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輯，《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李登輝口述，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共4冊）（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國史館，2008年）。採訪及側寫研究如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李登輝與臺灣的國家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英文版：Shih-shan Henry Tsai, *Lee Teng-hui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Richard Kagan（柯義耕）著，蕭寶森譯，張炎憲校訂，《臺灣政治家李登輝》（臺北：前衛出版社，2008年）。〔英文版：Richard C. Kagan, *Taiwan's Statesman: Lee Teng-hui and Democracy in Asi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⁵ 任育德，〈劉明修與臺灣歷史記憶的形塑——以「苦難」的書寫為中心〉，《臺灣風物》，第73卷第2期（2023年6月），頁83-116。

貳、海外臺灣人從事臺灣研究

有關劉明修個人資料介紹文章有限。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整理劉明修生平略歷，⁶ 現以表列顯示。

劉明修一生縱跨日治、戰後威權統治、戰後民主化時期；空間區位跨越臺灣、日本，且自1964年起長居日本。因為在政治訊息「另類空間」之一的日本，⁷ 得以有機會思考自身身分、臺灣處境、臺灣意識深化發展，因此研究臺灣歷史，撰寫專書。再在日本社會以研究者姿態，在雜誌撰寫文章議論時政。這也是海外臺灣人和臺灣鄉土的聯繫之一。劉明修的生涯發展，走上學者之路雖非最初職業規劃，⁸ 但是這種發展轉向都可視為他在自由意願下的選擇結果，也與時代脈動相互應。

⁶ 林瑩秋，〈李登輝見「伊藤潔」不見宋：一個黑名單的臺灣人幫李在日本奮力打拼〉，《財訊》，第225期（1999年4月），頁125-128；張茂森，〈東亞政治史權威 劉明修教授病逝〉（2006年1月17日），收錄於「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53537>（2023/02/27點閱）；伊藤潔（劉明修），〈『台灣青年』と私〉，（日本）《台灣青年》（月刊），第500期（2002年6月5日），頁60。此段節錄自任育德，〈劉明修與臺灣歷史記憶的形塑——以「苦難」的書寫為中心〉，頁86-97。

⁷ 在國共戰爭、美蘇冷戰期間，香港、日本也擔當政治訊息「另類管道」之一。容啟聰就香港個案研究指出，香港的政治環境容許南下知識人在香港辦學、辦報宣揚理念，在兩岸政權皆為專制統治情況下更為特殊。香港也成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樑，使相當數量流亡香港的知識難民得以遷居發展事業。容啟聰，〈綜論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識難民〉，《臺灣人權學刊》，第6卷第1期（2021年6月），頁92。存在於臺灣以外的「另類管道」對臺灣政治訊息傳播的衝擊，是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⁸ 宗像隆幸，《台灣獨立運動私記：三十五年の夢》（東京：株式會社文藝春秋，1996年），頁27。

表1、劉明修生平略歷

時間	經歷
1937	生於宜蘭。為家中長子。有噶瑪蘭族裔血統。
1945	就讀國校。
1951	入讀宜蘭農林學校（臺灣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6年。
1957	就讀臺灣省立農學院（現中興大學）。
1961	大學畢業。擔任太平山林場基層公務員2年。
1964	7月1日赴日，辭謝東京大學農學研究科入學，轉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
1969	以秘密成員身分，參與日本臺灣青年獨立聯盟活動留影。
1972.10	出席旅日留學生東京集會，公開發表政治言論。
1976.7.17-21	短暫返臺，將葉榮鐘保管之《林獻堂日記》影本攜帶至日本。
1980.3	東京大學國史學專攻，取得文學博士學位（課程博士）。
1982	歸化日本國籍，取名伊藤潔。
1983	山川出版社出版《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 受聘為津田塾大學、橫濱國立大學、二松學舍大學政經學部教授。
1993	中央公論社出版《台灣：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 第一次透過介紹，與李登輝正式見面，自此成為李登輝與日本接觸民間管道之一。
1995	受聘為杏林大學社會科學部、大學院合作研究科教授。
1996	株式會社文藝春秋出版《李登輝傳》。
1997-1999	協助安排PHP研究所江口克彥、自由作家上坂冬子、明治大學教授中村雄二郎等人到訪臺灣。
2002	6月發表〈臺灣青年與我〉。
2004	5月在《文藝春秋》發表〈陳水扁槍擊事件是臺灣的變數嗎？〉，是最後一篇具名文章。
2006	1月16日病逝。

資料來源：整理自伊藤潔（劉明修），〈『台灣青年』と私〉，頁60；林瑩秋，〈李登輝見「伊藤潔」不見宋：一個黑名單的臺灣人幫李在日本奮力打拼〉，頁125-128。

叁、《李登輝伝》是海外臺灣人「自我發現之旅」下的產物

1983年，東京山川出版社出版劉明修《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以東京大學博士論文修改成書）。周英明（1933-2006，筆名孫明海，時為刊物編輯長）在《臺灣青年》發表書評，提到過往臺灣人生活記憶中的吸食鴉片情景之外，也表示相關檔案多於戰爭結束時因機密性質遭到損毀，蒐集不易。周英明在書評點出，劉明修透過研究臺灣屈辱的歷史藉以產生自覺意識的重要意義。⁹ 此語指明，劉明修透過理解歷史，形成自覺意識，進而凝聚為一共同體的研究關懷。另一篇正式專業性書評，是津田塾大學教授許世楷（1934-，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在日本《史学雜誌》撰寫篇幅6頁半的推薦性書評。¹⁰

許世楷指出，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殖民地史研究在臺灣、日本所面臨的雙重困境：日本有保留資料有限問題；臺灣在資料開放有限情形之外，更面臨「研究禁區」的環境問題。這使得有志從事研究的臺灣人，必需在當時比起臺灣而言是更為自由開放的日本學術環境中，在1970年代起，才有辦法開展初步的學術研究。在7本研究成果都是以學位論文為基礎改寫者，其中6本由東京大學出版，劉明修專書由山川出版社出版，已是一大突破。¹¹ 許世楷的

⁹ 孫明海（周英明），〈書評 劉明修著『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近代日本研究双書）〉，（日本）《台灣青年》（月刊），第277期（1983年11月5日），頁15-17。周英明是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生，留學東京大學期間，因與王育德有共同親戚因緣，而加入《臺灣青年》，周英明取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東京理科大学，妻子是金美齡。

¹⁰ 許世楷，〈劉明修著『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近代日本研究双書）〉，《史学雜誌》（日本），第93卷第4號（1984年4月20日），頁521-527。1968年3月7日，許世楷提交1895-1902年臺灣民眾抗日運動主題博士論文，取得東京大學政治學專攻法學博士。按《史学雜誌》於1889年由史學會（現以公益法人形式存在）發行的月刊學術性雜誌，至今仍為日本歷史學界最具權威性的刊物之一。

¹¹ 許世楷，〈劉明修著『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近代日本研究双書）〉，頁522。戴國輝著作由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出版。春山明哲，〈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史研究の100年——伊能嘉矩から日本台湾学会まで——〉，《アジア経済》，第60卷4號（2019年12月），頁41。山川出版社

說法同時對應，身為在外臺灣研究者，在努力汲取海內外資源及知識同時；也同步蘊含責任——在海外比起當時臺灣更為優越的言論空間下，傳達東亞區域國家彼此理解歷史真相、交流之省思及信念。

這兩位臺灣青年社成員為什麼如此重視開放環境及研究者的責任？何義麟提出重要的觀察點，即戰後海外在日臺灣人的書寫，是一種在特殊情境下被迫使用日文（工具語言）進行歷史書寫，這和日本時代的臺灣讀書人「自我發現之旅」有部分神似之處，可說是另一波海外知識人的「自我發現之旅」。¹² 這種思想上的「自我發現之旅」經歷，使得戰後完成教育養成世代的許世楷、劉明修、周英明等人產生反抗現政權統治意識。研究者戴國輝（1931-2001）與《臺灣青年》成員是同一世代，但政治觀念不同。他也經歷了思想上的「自我發現之旅」：1955年底留學日本起，從「外」觀察臺灣，「既愛我出生之地臺灣，又深愛我祖先之原鄉，並關切它的前途。」¹³

海外臺灣人在思想及化為書寫的「自我發現之旅」，可以展現在透過資料面在臺灣史相關資料，蒐集日本相關史料進行討論，提升研究成果水準。許世楷的書評，就肯定劉明修著作討論日本殖民政權統治實像，既藉由研究臺灣統治及鴉片問題省思日本殖民政權；也研究臺灣鴉片政策轉變的原因，並非出自單一殖民者人物的英明判斷，是現實因素影響、推移所致。¹⁴ 許世楷從跨學科領域角度出發之書評指出，劉明修注重蒐集官書檔案、民間文書資料，細緻地就資料進行討論，再勾劃具體時段演變的研究長處。

劉明修為了撰寫論文，曾在求學期間透過關係，獲得葉榮鐘（1900-1978）同意出借手上擁有的林獻堂《灌園日記》17冊，供日本方面影印研究

創設於1948年8月25日，總部位於東京千代田區內神田，出版範圍從專業書籍到高中公民歷史地理教科書、參考書。〈会社情報〉，「山川出版社ホーム」：<https://www.yamakawa.co.jp/company>（2023/03/05點閱）。

¹² 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臺北：五南圖書文化公司，2015年），頁156。

¹³ 戴國輝，〈前言〉、〈中文版自序〉，戴國輝著，魏廷朝翻譯，張錦郎校訂，《臺灣總體相——住民·歷史·心性》，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編輯製作，《戴國輝全集2【史學與臺灣研究卷二】》（臺北：文訊雜誌社，2011年），頁128、126。

¹⁴ 許世楷，〈劉明修著『台灣統治と阿片問題』（近代日本研究双書）〉，頁527。

運用，劉明修也入境臺灣，參與將《灌園日記》影本帶返日本的行動。¹⁵ 由於《灌園日記》在臺灣歷史上具有「屬於全臺灣人的」意義，獲得歷史研究者評價為「反映出臺灣人的跨時代心聲」。¹⁶ 劉明修親身參與史料蒐集出土行動，再貫徹到研究及書寫，可說是「自我發現之旅」從思想到行動的一氣呵成。

劉明修往後持續在日本展開「自我發現之旅」。他從1990年代起持續深耕東亞政治相關議題，撰寫《李登輝傳》前，就臺灣歷史政治發展部分，撰寫通論書籍《台湾 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以下簡稱《台湾》）是由海外臺灣人在日本撰寫的臺灣通史類代表著作之一，1993年由中央公論新社歸入「中公新書」系列出版，2004年據知即銷售超過40萬冊。¹⁷ 至2020年12月已發行26版。

劉明修之所以撰寫《台湾》，一方面是中央公論出版社編輯方提出邀約，讓他想到1972年臺日斷交後，臺日經濟關係仍持續推展，但日本戰後世代對於這個近鄰的遠國儘管會當成受歡迎的觀光地點之一，日本人卻不盡了解此地歷史及現在發展，這使他身為臺灣出身子弟，希望藉著書籍書寫向日本人介紹臺灣。¹⁸ 他在寫《台湾》書稿時，也獲得臺灣當地李筱峰、楊碧川協助提供資料、確認史實，經濟專家劉文甫提供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相關資料，蔡易達協助資料出處確認，宗像隆幸提供海外臺灣人運動、美國國會

¹⁵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及註解，葉榮鐘原著，徐秀慧、葉芸芸主編，《葉榮鐘選集·晚年書信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20年），頁105。葉榮鐘為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時向林獻堂家族借走17冊《灌園日記》，在紀念集出版後以「日記是全臺灣人共有的」為由拒絕交還林家。直到葉榮鐘過世後，林博正（林獻堂長孫）始向葉榮鐘夫人討回葉氏生前保管日記。經林家後人努力搜尋，獲得日記27冊，交研究單位整理出版。見林博正，〈《灌園先生日記》序〉，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vi-vii。感謝研討會評論人許雪姬研究員提示相關資料。

¹⁶ 研究者評價見許雪姬，〈跋：《灌園先生日記》全套廿七冊出版完成記〉，《灌園先生日記（廿七）：一九五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493。

¹⁷ 伊藤潔日文原著，陳水螺漢英編譯，《臺灣歷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年漢英對照版），頁3。

¹⁸ 伊藤潔，《台湾：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3年），頁233。

聲援臺灣民主化相關資料。¹⁹ 這讓《台灣》不受限於官方立場資料，也具有在野人士在海外推動臺灣民主化、批判臺灣政治現況的意見，指出臺灣人在歷史中所經歷的「苦難」，從「苦難」中發現轉機，嘗試尋求形成一個共同體，反映海外臺灣人的史觀。

相較之下，李登輝從1960年訪問日本期間，秘密會晤王育德，²⁰ 留學美國攻讀博士期間和黃文雄等人往來，博士論文以臺灣農業發展為研究主題，同樣和劉明修等人一樣關注臺灣前途，他也是在海外經歷「自我發現之旅」者之一。李登輝和劉明修雖都有研究學者訓練，最大差異仍在活動場域，李以臺灣公部門專業經歷為主要活動空間，進而從政，成為第一位臺灣人總統，站在執政方立場。戰後部分在劉明修撰寫《台灣》研究中，已用4章篇幅（占全書12章的3分之1）處理，「詳今」成為劉明修《台灣》書寫特色之一，²¹ 由此延伸到在此時代中活動並崛起的李登輝此一代表「臺灣人」的執政者，是合理之事。

1996年文藝春秋出版《李登輝傳》，是目前所見第一本以日文寫作、劉明修為此訪談李登輝在臺灣、日本周遭學長、同學、學弟，他再到三芝等地尋訪求證，作者表示這些訪談都是為「努力提升本書的價值」。²² 值得注意的是，劉明修在1993年出版《台灣》已接觸到李登輝，他寫作《李登輝傳》期間，卻刻意未訪問李登輝本人探詢、求證。同時，作者雖然運用學術研究及視野進行分析，採內文註方式的書寫，並未詳註新聞出處。這顯示他運用學術手法寫作，但為面向大眾而選擇捨棄大量學術註腳徵引表現的方式。

劉明修在敘述大時代發展基礎概念，是架構在個人前作通史性《台灣》

¹⁹ 伊藤潔，《台灣：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頁233。李筱峰在教學研究之餘，也參與1980年代臺灣黨外雜誌編輯及時論寫作，楊碧川則有政治受難者的經歷，以民間學人姿態從事寫作。

²⁰ 河崎真澄，《李登輝密錄》（東京：株式會社產經新聞出版，2020年），頁120。

²¹ 任育德，〈劉明修與臺灣歷史記憶的形塑——以「苦難」的書寫為中心〉，頁106。

²² 伊藤潔著，白水譯，《李登輝新傳》（臺北：希望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4。出版公司於1998年8月21日登記解散，「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4OTQ2ODM0NQ==&banNo=89468345&disj=7A217F7950D117E777CC7884656B8AFF&fhl=zh_TW（2024/01/20點閱）。

基礎，描述臺灣民主化進程時，特別指出臺灣蔣氏父子威權統治的本質對臺灣人權造成傷害；臺灣民主是臺灣人在因應國際局勢變化下，辛苦爭取而得。劉以海外臺灣人角度重點書寫，李登輝身為第一位臺灣人總統，要如何進入國民黨統治體制出頭，在蔣經國去世後化解保守勢力抵抗，鞏固權力基礎，建立並帶動臺灣民主體制發展。因此，站在臺灣民主發展正方角色的不是蔣氏父子，而是李登輝。作者將個人史觀、經歷和時代融為一體進行敘述，具體書寫第一位臺灣人總統在面臨以往的「被治者」轉變成「統治者」時，如何以具體政績向外間證明臺灣人也是具有治國能力的。這是劉明修所理解的李登輝時代的重要意義。因此，筆者以為，從《台灣》是海外臺灣人歷史寫作成果之一言，同一作者延伸寫作的《李登輝傳》也可被視為海外臺灣人歷史寫作的成果之一；其同時也成為「李登輝學」相關架構文本及研究基礎之一。

劉明修以《台灣》架構的政治描述為基礎，在《李登輝傳》進一步從權力面分析，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1981.12-1984.5出任臺灣省主席），而不選擇林洋港（1927-2013，1978.6-1981.12出任臺灣省主席），是因為林某「過於顯露頭角」引發蔣經國戒心。蔣經國「天威難測」的提名決定，讓政治根基較薄弱的李登輝頓時領先林洋港，也埋下日後林、李二人格格不入，最後成為李登輝的政治競爭者之一的發展。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雖居於副手地位，卻因蔣經國健康不佳，意外獲得職務歷練，得以蓄積政治能量、提升威望。李登輝並代表中華民國於1984、1985年出訪南非、巴拉圭、烏拉圭等國，1985年出訪時回程途經美西、東京，成為李登輝從政生涯任內最後一次造訪日本的紀錄。在國民黨內，李登輝雖然黨齡不深，在國民黨中常委也排名第三，擔任黨內「政治革新特別小組」召集人，黨內地位已有提昇。總體而言，蔣經國自認可以完成總統任期的考量下，李登輝確實完成受到交付的任務。²³ 此一分析在近年相關研究討論時，仍獲得一定支持，²⁴ 近年《蔣經國日記》在1978年相關記載中，已見考察後記載對林之警

²³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84-91。此說為作者在《台灣 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頁217）的延伸說明。

²⁴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戒：「林洋港之為人逐漸可以發現其好名善變，不可不防。」「初任省府主席，由其言行可以發現此人沽〔沽〕名釣譽、好大喜功，不但難成大事，恐將害事，應密切加以注意。」²⁵ 這顯示劉明修依據寫作時所見資料、環境所下判斷，具有其依據及合理性。

劉明修在《台灣》、《李登輝傳》總結李登輝執政風格差異為：一、李登輝在擔任總統之前，和國民黨政權下的臺灣人政治家一樣顯示「柔順的態度而不表露自己的主張」。李登輝在尚未掌握黨政軍特權力之前，「也甘心成為黨內外省人元老所期盼的『傀儡』」。二、李登輝執政後，在臺灣人支持下「引導臺灣脫離外來政權的占領體制，結束名實不符的內戰狀態和侵犯人權的世界最長戒嚴時期，以民主化實現臺灣住民的期望」。²⁶ 劉明修透過《李登輝傳》，再度表述《台灣》架構的戰後歷史面貌，以及其身處之海外臺灣人政治運動群體所期望的「自主」目標。劉明修也在《李登輝傳》中譯版《李登輝新傳》發行時表述，該書可以讓國民藉由了解領導人，合理判斷臺灣未來的走向。²⁷ 這是作者就其寫作立場對臺灣讀者的公然表態。

劉明修將對臺灣故鄉正面期望投射到李登輝，或許也反應部分同一時代相當數量海外臺灣人的想法。即便是像留日學者戴國輝，政治立場和劉明修不同，也在1996年自日本立教大學退休，返臺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至於戴國輝後來與李登輝立場相異，且公開撰述「具遺書性質」的作品表態。²⁸ 戴氏「由期待轉為失望」不同反應如何產生，並非本文處理主題，就不予討論。

限公司，2021年），頁472-474；李福鐘，〈蔣經國晚年接班危機與威權體制鬆動〉，《臺灣風物》，第71卷第3期（2021年9月），頁55-110。

²⁵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8-1979》（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22、41，1978年6月27日、7月29日上星期反省錄。

²⁶ 伊藤潔，《台灣：四百年の歴史と展望》，頁219；伊藤潔著，白水譯，《李登輝新傳》，頁5。

²⁷ 伊藤潔著，白水譯，《李登輝新傳》，頁5。

²⁸ 小倉方彥著，李毓昭譯，〈從期待到失望——評《愛憎李登輝》〉，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記錄整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頁428-430。

據研究者非正式統計，「李登輝」從1994年左右開始大規模出現在日本雜誌、新聞報導，這與臺灣民主化推動憲政改革、政治改革有關，也為李登輝創造出亞洲「強有力的領導者」形象。1994年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談也反映臺灣人所處歷史現狀，喚起日本人的共感。²⁹ 在此言論環境下，劉明修向日本讀者訴求的是，期望他們透過閱讀以增進對臺灣的理解。這並非劉一人有此感受。至少在1990年，《台灣青年》即有言論表示，當下日本只較為熟悉臺灣經濟訊息，對社會、文化、歷史訊息是非常不足。³⁰ 這也促使劉明修在書寫李登輝時，不忘介紹臺灣民主化訊息。他在日文版開篇提及：本書藉由描寫李登輝的人生軌跡及其為人，介紹圍繞在臺灣嚴酷的國內外環境，期待各鄰國深化理解、關心臺灣民主化的趨向。民主是跨國界的，臺灣面臨強鄰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主義威脅，總統李登輝高舉民主化對抗共產主義，自有意義。³¹

劉明修語意中的「各鄰國」，不止限於臺灣地理周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包括日本。「各鄰國」用語也同時呈現劉明修認為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兩國」之理解。若再留意《李登輝傳》日本的出版時間為1996年2月25日，時值中華民國將進行第一次總統直選（「臺灣海峽飛彈危機」）。作者解明1990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透過軍事方式威脅臺灣的新局勢，這是《台灣》一書討論時段之外的延伸發展。中華民國遭遇中共政權外力威脅之時，持續進行政治轉型、完成第一次總統民選，在中華民國民主化歷史發展具備重大意義。總統李登輝透過外電關切臺海發展動向，明確對外傳播我政府不向敵對外力壓迫低頭的訊息及態勢。劉明修深具自信的在《李登輝新

²⁹ 清水麗，〈蔣經國・李登輝時期的日台關係の变容——日華・日台の二重構造の遺産——〉，《問題と研究》，第41卷第3號（2012年7.8.9月號），頁24。

³⁰ 陳唯明，〈戴國輝著『台灣』を読んで 国民党政権に媚を売り、歴史を偽造〉，《台灣青年》，第358期（1990年8月5日），頁14。據記載，戴國輝使用「典雅的日文」寫作《台灣——人間・歷史・心性》，岩波書店在出版半年內發行4刷，賣掉6萬本。戴國輝著，魏廷朝翻譯，張錦郎校訂，《臺灣總體相——住民・歷史・心性》，頁319。這應該是刺激《台灣青年》會在一年後的348期（1989年10月）轉載李喬、許世楷文章，在刊物358期（1990年8月）刊登陳唯明專文，進行書籍評論及批判的觸媒。

³¹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15-16。

傳》中文版序言：「由於筆者曾以數年功夫考證各種說法，對釐清有關李登輝先生的各項傳言頗具斧定之論，亦使李登輝先生的生平能擺脫稗官野史的傳述。」³²《李登輝新傳》也在1996年日本《史學雜誌》年度出版文獻回顧中，受到關注。³³

劉明修在日文版〈寫在前頭〉沿襲在《台灣》書寫基調，並補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分析何以要介入臺灣總統大選。他將臺灣高層權力之爭定調為，外省人喪失特權的一方，之所以攻擊李登輝，是為借中共政權威嚇阻止民主化、保持特權。中共政權警戒臺灣推動民主化、實施經濟發展提高國家地位，擴大國際社會空間，具備獨立國家實質，進而偏離中共政權所代表之中國，正好與中共實施「一黨獨裁」下的中國統治兩相對照，呈現不同的發展可能，是故抨擊李登輝。但李登輝並未因相關抨擊而受挫，反而以接受日本、美國教育，秉持民主主義抱持信心的態度應對。³⁴ 李登輝訴諸民主主義是跨越國界的態度，是值得讀者重視的。這就是受過日本、美國教育的李登輝展現的民主素養。

如從研究者回顧歷史後見之明顯示，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時期，一是突破蔣經國執政晚年布置黨政集體領導局面，李登輝卻在執政五年後逐一拆解；³⁵ 二是重組對日政策，任用懂日語的臺灣人參與對日工作，在蔣介石時代起除日華懇談會外，也重用學界、商界各類管道，並親自主持相關決策，成功脫離國內戰格局，形成新的臺日關係運作方式。³⁶ 黃偉修解析李登輝總統任期內之大陸政策，指出在李登輝個人領導特質之外，政府決策也

³² 伊藤潔著，白水譯，《李登輝新傳》，頁4。

³³ 小林孝純，〈東アジア：中国：現代（一九九六年の歴史学界——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第106卷第5號（1997年5月），頁908。

³⁴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13-16。

³⁵ 李福鐘，〈蔣經國晚年接班危機與威權體制鬆動〉，《臺灣風物》，頁103-104。關中稱，「政交給俞國華、黨交給李煥、軍交給郝柏村」，三人因貌、心都不合，而給予李登輝機會個別瓦解。關中口述，張景為著，《明天會更好：關中傳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94-203。

³⁶ 清水麗，〈蔣經國・李登輝時代の日台関係の変容——日華・日台の二重構造の遺産——〉，頁23-25。

有參與閣員及組織涉入層面的影響面存在。³⁷

以下以表列方式比較劉明修、蔡石山（1940-）、柯義耕（Richard C. Kagan, 1938-）三本學術性傳記之章節分布：

從表2可歸納如下：一、三本專著均按照傳主生平事蹟發展，以線性時間依序討論。二、三本專著均運用相當篇幅描述李登輝總統任期內如何結束一黨專政、鞏固臺灣民主有關作為。三、蔡石山專著以近半篇章描述李登輝所處日治、戰後臺灣時段，顯示作者注重時代變遷。劉明修著作以過半篇章，分從李登輝就任總統後面臨權力鬥爭如何勝出、如何開展務實外交、抗拒中共文攻武嚇敘述其護衛臺灣民主作為，顯示作者「論今」面的時代關懷。柯義耕則使用具文學性對比標題或文字（諸如浮士德、禪宗與基督教等）為李登輝人格定義。四，劉、蔡、柯三著在史料蒐集運用面顯現不同時代特色。劉明修在網際網路發展前著作，因此為實體資料。蔡石山、柯義耕著作時間為網際網路發展期，故在實體資料外，蒐集資料範圍擴及網際網路。柯義耕引用中、英文著作，以及日本學者相關英譯研究，雖然引用劉明修《台灣》一書之譯本，但並未將日文《李登輝伝》列入徵引參考書目。五、三本著作在實體資料外，均使用訪談。蔡石山、柯義耕更標註曾訪問傳主本人、進行近身觀察。六、三本專著在出版之後，均未修訂再版。這或許因為傳主本人在有關學術傳記出現後，仍持續發表言論，促進其他新著出現有關。

有英文書評對蔡石山著作的平衡報導、敏銳而典雅書寫特色表示肯定，也肯定柯義耕將李登輝放上東亞政治國際政治博弈的行動者分析。³⁸ 不同學術書評作者在英文書評指稱，柯義耕書籍在英文有關臺灣民主歷史書寫有其

³⁷ 黃偉修，《李登輝政權的大陸政策決定過程（1996~2000年）——組織的決定と独断の相克——》（岡山県岡山市：株式会社大学教育出版，2011年），頁11。

³⁸ Murray A. Rubinstein, "SHIH-SHAN HENRY TSAI. Lee Teng-hui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xviii, 271. \$65.0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3 (June 2006), pp. 812-813; Murray A. Rubinstein, "Lee Teng-hui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and: Taiwan's Statesman: Lee Teng-hui and Democracy in Asi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3.4 (November 2011), pp. 250-252.

表2、李登輝傳記著作章節分布比較表

著作 時間	劉明修（1996）	蔡石山（2005）	柯義耕（2007）
時代背景	寫在前面	第1章 李登輝誕生時的臺灣	第一章 為何是李登輝 第二章 臺灣：群島、殖民地、非國之國
青年	一、少年時期 二、青年時期	第2章 一個臺灣經濟學人的日本教育 第3章 受困於戰爭與屠殺的鉗口	第三章 兒童時期 第四章 戰爭、婚姻、基督教
農委會及學者	三、走上學者之路	第4章 一個學者的形成 第5章 皈依基督教轉向國民黨的李登輝	第五章 康乃爾年代：民主的體驗
從政自政務委員到省主席	四、轉而成為政治家	第6章 初嚐權力 第7章 省主席與副總統時代，1981-1987	第六章 技術官僚從政 第七章 臺灣的浮士德：一位具有禪宗與基督思想的省主席
從政自副總統到總統	五、榮昇副總統 六、登上總統寶座		第八章 解除黨國體制：從自由化到民主
從政總統任期	七、提名副總統的政爭 八、和郝柏村二人三腳 九、與郝柏村形同水火 十、推動務實外交 十一、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十二、瀕臨分裂的國民黨 十三、夙願的美國訪問 十四、要拉下李登輝的文攻武嚇	第8章 李登輝總統，1988-93 第9章 領導臺灣鞏固民主 第10章 結語	第九章 臺灣的民主 第十章 軍事與兩岸策略 1991-2000 第十一章 塑造「新」臺灣 第十二章 李登輝掌舵下的臺灣：從一黨專政到民主政治 第十三章 何以李登輝是個政治家？

資料來源：整理自伊藤潔、蔡石山、柯義耕著作。各章名稱文字依據中文翻譯版。

貢獻；但也有意見稱書籍像是「聖徒傳記」（hagiography），而無從陳述李登輝在亞洲民主發展之關鍵地位，或者是寫作部分歷史事件時代有誤等史實硬傷。³⁹ 這也可能是進一步書寫李登輝生平時所面臨的學術挑戰，亦即勿在書寫歷史人物時，過度將其「神聖化」，落入單線性書寫，忽略其面臨時代限制的部分，從而減低批判性思考的情境。

肆、透過新出土資料探討李登輝個人史重建案例

劉明修《李登輝傳》在考察、判斷有其值得肯定之處，研究者也必須注意受資料所限，在書寫分析未竟之處，而在更多材料逐步出現時，予以釐清及解明因果關係。由於筆者能力有限，無法也無意在本文針對李登輝生平相關個人史及事件進行詳細分析，因此本文只就兩項案例探討，以期理解有關「李登輝學」在李登輝與時代有關議題中可資注意之處。

一、案例一：有關加入中國共產黨問題

劉明修注意到，李登輝求學時期的人際脈絡，與當時臺灣在日、在美留學學生精英的重疊。諸如在京都帝國大學求學期間，曾因太平洋戰爭導致生活匱乏，頻頻造訪臺北高等學校學長王育霖（1919-1947，時任京都地方法院檢察官）的家。到1994年3月李登輝拜會王育霖太太王陳仙槎（1922-2020），哀悼故人之死同時也為曾受人恩惠致謝。⁴⁰ 根據研究稱，日本在大正時代起，帝國大學生們閱讀有關書籍，是希望綜合性理解英國的古典經

³⁹ 肯定者如June Teufel Dreyer, “The Soul of a Statesman”, *Taiwan Review*, April 2008,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4&post=4334>, accessed date: 2023/08/08 ; J. Bruce Jacobs, “Taiwan's Statesman: Lee Teng-hui and Democracy in Asia. Richard C. Kaga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xii + 231 pp. \$30.00. ISBN 978-1-59114-427-4”, *China Quarterly*, 193 (March 2008), pp. 178-179。批評者如Bernard D. Cole, “Taiwan's Statesman: Lee Teng-hui and Democracy in Asi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3 (Summer 2008), pp. 141-143.

⁴⁰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42-43。

濟學、德國的古典哲學、法國的社會主義。⁴¹ 臺灣就讀高校的青年學生受到「大正教養主義」影響、仿效閱讀書單同時，在「精讀、速讀、亂讀」策略下讀懂與否，是因人而異。⁴² 近年新出版回憶錄、史料顯示，李登輝就讀京都大學時期和同時代學生一樣開始閱讀社會主義書籍。1946年起返臺，就讀臺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時，他持續閱讀《資本論》，也參與農業經濟學會擔任常務理事。他以中文在集會發言時曾透過吳克泰（1925-2004）協助翻譯，和地下黨人有不錯的交情。甚至有李登輝一度為經營舊書店，和其他參與者共同加入「新民主同志會」、1948年間退出的記載。⁴³ 1949年在臺灣大學擔任助教期間，他也受到何既明（1924-2011，本業醫師）邀約參加書店開設計畫。⁴⁴ 這顯示李登輝早年思想形成歷程既跟隨著日本精英養成方式，也受時局環境激盪和中共地下黨人有所往來。

當李登輝的統治權力逐步穩固，面對外間有關加入中共疑問，在不同時間點表示，其參加有社會主義人士或地下黨員同在團體為事實，但否認其受吳克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否認政治檔案有關臺灣省工委會臺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係經其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領導說。⁴⁵ 李登輝在權力尚未

⁴¹ 研究者稱，所謂「大正教養主義」，既是從明治時期「西歐崇拜」的教養平順地轉向馬克思主義發展，同時日本古典文獻學訓詁風氣影響下，也讓日本馬克思主義講究原典閱讀，形成精英特有的學術風氣，和大眾消費文化形成鮮明差異。筒井清忠編輯，《大正史講義【文化篇】》（東京：株式会社筑摩書房，2021年），頁84-85。

⁴²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臺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年），頁190。戴國輝對李登輝讀書能力的質疑，見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記錄整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頁307-308。

⁴³ 許雪姬、林正慧主編，《保密局臺灣站：白色恐怖資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年），頁368-369。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1冊，頁162。吳克泰也表示，和李登輝曾經無話不談。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頁167-168、243-244。另，口述訪談自稱擔任農學院自治會理事長到畢業，見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1冊，頁163。

⁴⁴ 陳舜臣提及，參與合開舊書店五人有一人出事〔按：為林如堉、劉甲一〕，一人早逝。陳舜臣著，林琪禎、黃耀進譯，《半路上》（臺北：游擊文化，2016年），頁287-288。〔日文版：陳舜臣，《道半ば》。東京：集英社，2003。〕

⁴⁵ 有關為葉城松入黨介紹人，見「黃君參加叛亂之組織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五年」（1954年9月10日），〈鍾鎮業等案〉，《國防部軍務局》，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穩固以及臺灣剛脫離戒嚴時期，對此刻意不談，從個人心理、環境面而言，都可理解選擇如此的理由。也就是因此，他直到離開總統公職後，接受國史館口述訪談，始正面承認在「新民主同志會」期間（1947.10-1948.6）短暫入黨即退黨，仍然否認其受吳克泰領導已先加入中共說。李登輝透過接受官方史政機關口述訪談，以個人敘述加史政機關相關研究記載，藉以否認所謂「二進二出」說，只承認「一進一出」說。⁴⁶ 李妻曾文惠曾獲朋友親戚通知，有朋友遭逮、經軍法機關處決，當妻子事後告知完成美國碩士學業返國的李登輝，夫婦沈默。⁴⁷ 此事敘述本意要表示時代肅殺氛圍，無意間從旁佐證李登輝臺大求學時期相關人脈，並未全然因政治因素而斷絕。

劉明修書寫時代，當時並未見到李登輝相關入黨人士接受口訪、回憶錄、官方檔案資料。他的判斷，是從中共甄審預備黨員到正式黨員具有固定觀察期、考察程序進行判斷，由於李登輝並未符合相關程序，同時在1947年間一度躲藏避禍，家族有喪事處理而難以積極讀書會活動等因素，難以明確認定其是中共正式黨員。⁴⁸ 劉明修在審慎判斷的同時，也承認因社會時局及思想接觸，李登輝親近受社會主義影響的臺灣青年與地下黨人的事實。

何既明（李登輝老友）稱，李登輝心思縝密，對中共抱有戒心，因此應該不會留下證據，否則難以通過抓住些許訊息緊抱不放的情報系統追查。⁴⁹ 戴國輝也提到，李登輝曾是進步類學生（參加臺北「沈崇事件」遊行），不

藏，檔號：B3750187701/0043/1571/82118432/158/057。2019年2月27日，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已公告宣布撤銷有罪判決公告，見「公告受難者黃頂君等1056人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撤銷公告名冊（一）序號第245~483號』」，〈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撤銷有罪判決公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65000000A/0107/600/001/0003/002。否認說法見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1冊，頁173-175、179。張光直提問及戴國輝觀察，見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記錄整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頁405-406。

⁴⁶ 詳見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1冊，頁152-195。

⁴⁷ 上坂冬子，駱文森、楊明珠翻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頁88-89；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1冊，頁184。

⁴⁸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47-50。

⁴⁹ 上坂冬子，駱文森、楊明珠翻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頁68。

太提認識哪些人，不願意別人知道太多他青年時期的背景，將之視為英雄「不喜歡熟悉他過去歷史的人在身邊逍遙」。他傾向支持「二進二出」說。⁵⁰

吳克泰方面則稱，發展李登輝入黨。但若從吳氏回憶錄，不時可見他如何參與組織活動、和組織中何人接觸的記載，僅提及和李登輝在曾家接觸談話「算是過組織生活」，以及雙方協議保密事項，⁵¹ 隱然流露「黨組織內」和「黨組織外」之間的明確區別。李登輝是否真被中共地下黨人視為「自己人」，是值得討論的。因此，劉明修依照相關程序所作推論，分析吳克泰所言，有其根據。

至於李登輝日後表述，自己在「新民主同志會」期間活動，會強調自己加入退出沒有正式程序，到固定地點參與討論，所見者固定，且退出得早，其他成員不認識他。「新民主同志會」之所以遭到破獲，是因其他案件的參與者與團體重疊。團體剩餘參與者一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並未將他供出，使他直到1969年才因涉及此組織遭警備總部約談。他日後承認見過所謂「新民主同志會」的地下黨領導徐懋德（1920-2018），不忘表示與徐意見不合，也不想過地下黨所謂以共產黨為中心的「組織生活」，即藉機退出。⁵² 王作榮（1919-2013）就其個人經驗，展現另類解讀，即李登輝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即使加入過，也非真正的黨員，加入又退出表示「是真正趕時髦，沒有真正的信仰」。⁵³ 這一論點可和劉明修分析參考。

劉明修也注意到，李登輝留學康乃爾大學時，因是當地最年長的臺灣學生，常請年輕留學生到家請吃親手燒烤牛排，得到「牛排李」外號，結識

⁵⁰ 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記錄整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頁299、313-314、318。

⁵¹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68、244。

⁵² 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1冊，頁173-186。李禎祥有關白恐時期特殊分子考管研究文章指出，就現有官方資料，李登輝經警備總部拘訊後，列為「自首份子2294」，因任職農復會由調查局考管。警備總部在1969年列舉「匪諜或匪諜組織案」10案、13犯中，其中一人就是李登輝。李禎祥，〈白恐時期的特殊份子與考管〉，《臺灣史研究》，第30卷第3期（2023年9月），頁115。

⁵³ 戴國輝、王作榮口述，夏珍記錄整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頁333。

1970年「四二四事件」主事者黃文雄（1937-）、鄭自才（1936-）。但李登輝和政治保持距離，拒絕出任當地學生參與的臺灣同鄉會長。情治機構也在「四二四事件」後調查李登輝，使他無法獲得訪問泰國的出入境許可。但也因情治機構的調查使李登輝「轉禍為福」，在徐慶鐘（1907-1996）、沈宗瀚（1895-1980）幫助下過關，再經由二人提攜，向蔣經國報告臺灣農業議題，開啟進入政壇的機會之門。⁵⁴ 劉明修有關李登輝與海外臺灣人表面保持距離的描述，近年在其他資料出土後，進一步提供二者之間有著共同關切及私下聯繫之旁證。⁵⁵ 他人在後續不同途徑蒐集材料的作品，更鮮活顯示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既受到同時代民主風氣洗禮的影響，也在對話中關切臺灣人民的生計。⁵⁶ 劉明修在資料尚未齊備時，即注意到此一面向，是研究者有其研究「共感」的表現。

劉明修推論在研究「共感」之外，部分細節也面臨不同說法的考驗。諸如陶涵提及，在1970年情治機關清查李登輝時，徐慶鐘、蔣彥士（1915-1998）曾向蔣經國力保，最後受到採納，結束對李之調查。⁵⁷ 2001年，李登輝述及學者從政歷程，提到其專業受到重視，使蔣經國要用他之前，先透過情治機關詳細調查「洗白」，再由李煥（1917-2010）、王昇（1915-2006）相繼向蔣經國推薦。李登輝在2004、2008年相繼口述補充，蔣經國因為「企圖澄清一些疑慮」，才讓警總進行約談。蔣經國不會單方面聽推薦，會先透過第三者觀察、評估，再決定是否用人。⁵⁸ 李煥則提到，在臺灣省黨部任內邀請李登輝演講農業問題，得到正面印象，當蔣經國思考尋找農業專才以達

⁵⁴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64-67。

⁵⁵ 河崎真澄，《李登輝密錄》，頁120-121。柯義耕訪問蔡武雄，蔡武雄自承是他擬稿聯同康乃爾臺籍留學生報紙投書抨擊經濟學者劉大中，李登輝並未參與其事。Richard Kagan（柯義耕）著，蕭實森譯，張炎憲校訂，《臺灣政治家李登輝》，頁147。

⁵⁶ 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李登輝與臺灣的國家認同》，頁152-155；Richard Kagan（柯義耕）著，蕭實森譯，張炎憲校訂，《臺灣政治家李登輝》，頁142-145。

⁵⁷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9.

⁵⁸ 2001說法見上坂冬子，駱文森、楊明珠翻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頁105-109、119-120。2004說法見李登輝筆記，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註，《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頁9。2008說法見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第2冊，頁13-14。

「農工平衡」時，他推薦了李登輝。他後來得知蔣經國接見李登輝談話，聘其出任政務委員。⁵⁹ 這是來自推薦者方的說法。研究者柯義耕則認為，王作榮向蔣經國的推薦也起了作用。⁶⁰ 筆者以為，這些不同說法恰好顯示出自不同管道的人事推薦傾向，以及蔣經國「疑人勿用」的用人作法。如果單獨將李登輝從農經專家轉向從政歸諸於單一個別推薦，就不盡接近環境形勢。

目前透過蔣經國已出版之1970年代日記可以確認，蔣經國接觸青壯精英們就包括李登輝。1972年2月4日，蔣經國簡略記載「分別接見外交人員房金炎、農業專家李登輝、青年學人鄭貞銘、臺東縣長黃鏡峰，皆為青年有為之士。」蔣經國又特意翻檢臺籍高級人事資料，慨歎要有時間培養。⁶¹ 有關記載得以確認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受蔣經國接見的時間點。其看待政務委員有兩種人事意義，一為安置「不得不用」卻不放心「過問業務」者；一為新人培養管道。在蔣經國1972年籌組行政院時，曾拿名單幾次請示總統蔣中正後定案。⁶² 顯然，李登輝具備專業能力，受到不同來源、重複推薦；加上蔣經國為因應1970年代政府面臨外交逆境，為求政權存續，政權內部人事進行新陳代謝，需要擴大引進政治新血及臺籍精英增進政府支持度。⁶³ 這些都鋪墊出李登輝學者從政的空間。因此，他人敘述和李登輝敘述各有其認定的現實意義。

⁵⁹ 何智霖、薛月順執行編輯，《蔣經國與臺灣：相關人物訪談錄（第一輯）》（臺北：國史館，2010年），頁68。

⁶⁰ Richard Kagan（柯義耕）著，蕭寶森譯，張炎憲校訂，《臺灣政治家李登輝》，頁153-154。

⁶¹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2》（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46、100，1972年2月4日、4月7日。

⁶²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6》（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130、135、168，1976年6月3日、6月11日、7月25日。

⁶³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Prospects for Stability on Taiwan", February 10, 1972, pp. 10, Document Number (FOIA) /ESDN (CREST): CIA-RDP85T00875R001100130029-1, accessed date: 2020/10/4. 李煥則提到，蔣經國以「培養人才」為重點，「本土化」是臺灣環境下「培養人才」的必然結果。何智霖、薛月順執行編輯，《蔣經國與臺灣：相關人物訪談錄（第一輯）》，頁60。

二、案例二：出訪非洲的外交因應

1970年代，蔣經國逐步登上外交舞臺，以對日本決策體制言，也從「蔣介石——張群」核心轉向為以蔣經國、黃少谷為首的五人核心小組；也因為國際地位的孤立，逐步從中華民國外交開始過渡轉換為以臺灣為中心的外交。⁶⁴ 在李登輝六年行政院政務委員任內，雖以國內農經政策議題為主，卻也已初步涉及農經學術交流、承擔國際出訪任務。從現有李登輝政務委員任內出訪紀錄，有東加王國一次，南非、剛果一次。

現有著作中，劉明修是順年度書寫國際、國內政治環境下臺灣發展，僅在正文簡述擔任東加王國慶賀特使；並未在年表記入出訪非洲。⁶⁵ 蔡石山、柯義耕也並未處理1970年代的非洲出訪。前面所提著作未能處理原因，或與當時所公開檔案、新聞報導均屬有限，故未能探究這兩次經驗對李登輝外交活動的先導意義。

從目前臺灣可找到的資料顯示，李登輝出訪東加王國之前，事先要接受外交部禮賓人員指導國際社交禮儀，以求在出使期間表現合乎禮儀。在李登輝擔任特使時，由外交部駐地公使代辦高錚（1920-）為副特使協助。⁶⁶ 這也是李登輝第一次正式代表政府出任外交特使。東加之行路程曲折，必須先到火奴魯魯，轉搭乘美國軍艦到東加，返程相同。李登輝日後也表達出訪留下對東加風土民情之印象。⁶⁷ 其他詳細東加出訪內容、心得，目前付之闕如，

⁶⁴ 清水麗，《台灣外交的形成：日華斷交と中華民國からの転換》（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年），頁251-260。

⁶⁵ 伊藤潔，《李登輝伝》，頁74、235。

⁶⁶ 〈總統令〉（1975年10月24日），《總統府公報》，第2955號（1975年10月24日），頁1。

⁶⁷ 〈總統伉儷在總統府接見來訪的戈巴契夫伉儷〉（1994年3月23日），收錄於「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3415>（2022/1/31點閱）。依照外交部《八十六年外交年鑑》記載：中華民國與東加於1972年4月10日建交，派當時駐澳洲大使沈鈺兼任大使，1975年6月在東加設立大使館，派高錚公使為代辦，1979年5月高錚公使升任為駐東加特命全權大使。杜包（四世）國王偕王后第一次訪問臺灣時間為1977年。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八十六年外交年鑑》，「第三章 中外關係第一節 我國與亞太地區國家關係」電子版，收錄於「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s://multilingual.mofa.gov.tw/web/web_UTF-8/almanac/almanac1997/3-1-1.html（2023/03/19點閱）。

甚為可惜。

至於李登輝出訪非洲活動及大要言論，可以透過解密外交部檔案，在臺灣新聞概略總結報導外，⁶⁸ 描繪相對清晰面貌。1974年5月20日，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劉宗翰（1915-）擔任主席，邀集中華民國籃球協會、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裕隆籃球隊、教育部、外交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召集「商討派遣裕隆籃球隊赴東南非比賽有關事項協調會議」。會議紀錄顯示，中共加入聯合國後，派出各類球隊到非洲訪問，僑委會應當地親臺僑領呼籲派遣純民間籃球隊前往訪問，以「爭取僑胞向心，促進體育交流，兼作『打擊匪偽統戰陰謀』」。因此會中屬意由獲得三項公開賽冠軍的裕隆隊出訪，教育部、僑委會已報院奉准補助經費在案，裕隆汽車公司同意負擔其餘經費。外交部出席代表康韶和表示：非洲最後一站宜以南非為佳。僑委會秦福民科長表示，行程尚未定案，當遵照外交部意見辦理。⁶⁹ 非洲司表示，1972年曾擬派籃球隊前往莫三比克比賽，由於葡萄牙有政治考量，拒發簽證，因此宣告中輟。非洲司另稱，東南非洲受英國風氣影響，籃球運動風氣未盛；若在白人統治地區出賽，是否會引發「黑人非洲友邦之誤會，似宜考慮。」因此非洲司5月29日補充，會派遣熟悉地區情勢者一併隨行協助。⁷⁰ 外交部國際司6月11日簽報，由非洲司科長杜稜以顧問名義隨行，外交部支付差旅費。⁷¹ 6月26日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會長嚴慶齡（1909-1981）發函，6月20日中國國民黨社會工作會推薦政務委員李登輝擔任領隊，轉呈請行政院同意以辦理出國手續。⁷² 這當是李登輝出現在相關案件之正式紀錄。籃球隊最後自7月23日起到8月27日間出訪，超過1個月時間。從

⁶⁸ 王宗蓉，〈裕隆籃院訪非收穫豐碩〉，《中央日報》，臺北，1974年8月28日，版5。

⁶⁹ 「商討派遣裕隆籃球隊赴東南非比賽有關事項協調會議紀錄」（1974年5月20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⁷⁰ 「外交部非洲司簽稿」（1974年5月29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⁷¹ 「外交部國際司簽」（1974年6月11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⁷²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致教育部函」（1974年6月26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現存檔案顯示，這場「體育外交」側面展現李登輝身為團長初始表現的領導者風度與判斷能力。

球隊出發之前，7月17日，南非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回報臺北，當地華僑體育總會不滿臺北要求不得安排與白人球員、球隊比賽，總會以無法回收投入賽事經費為由，決定取消裕隆隊與華僑隊比賽安排。⁷³ 7月23日中午，全體成員從臺北出發，⁷⁴ 抵達模里西斯。當地華商及政界人物朱梅麟（1911-1991）安排李登輝前往總理公署，晉謁該國代理總理及青年體育部長，且經安排在當地西商工商總會以「經濟發展問題」做專題演講。該演講邀請相關外國使館、當地記者、體育總會負責人等出席。聯合國糧農組織正好也在當地集會，李登輝即與相關人士交流。朱梅麟因此表示，球隊此行為中華民國政府達成「體育外交」、「國民外交」兼顧局面。⁷⁵

球隊出訪行程在南非、中非區段，外交部、各地使領館反應有所不同。因出訪球隊受限交通轉接問題，不得不更改行程，延長中非共和國停留時間，洽逢8月6日至13日舉辦「非馬模共同會議」，全隊成員僅能接受該國安排居住、膳食於青年中心。⁷⁶ 8月6日晚，裕隆隊過境南非約翰尼斯堡，7日遊覽，8月8日午、晚宴後，因球隊需要練球，當地體育會請求「華僑籃球隊」參加練習賽，經使館同意舉辦閉門友誼示範賽。8月9日晚球隊搭機前往中非首都班基。⁷⁷

中非使館相關反應不同，獲知裕隆全隊後因班機轉機延誤，直到10日才到達中非班基，導致歡迎酒會被迫改期又因忙亂而通知不周。中非大使館

⁷³ 「南非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7月17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⁷⁴ 中央社，〈裕隆籃球隊啟程訪非洲〉，《中央日報》，1974年7月24日，版3。

⁷⁵ 「朱梅麟函」（1974年8月5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按外交部非洲司科長杜稜完成模里西斯、留尼旺、南非部分任務後，先行返國。

⁷⁶ 「南非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7月26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⁷⁷ 「南非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致外交部函」（1974年8月14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為此發電外交部抱怨，他地外館橫向聯繫不足。⁷⁸所幸領隊李登輝及時趕上使館安排參加中非共和國獨立紀念慶典。⁷⁹中非政界人士本欲示禮遇，安排正副領隊李登輝、鄧承先改住入旅館，李領隊即以「責任為重，堅持留在青年中心與球員共膳宿，俾便照顧」。李登輝另外從事的公務行程，包括：1、乘便前往當地農耕隊、公路隊聽取相關簡報；2、球隊參與中非獨立紀念檢閱遊行大典外，李登輝、鄧承先也應邀出席國宴；3、拜會該國代理青年體育部長；4、8月16日由林志鴻代辦陪同拜會中非總統卜卡薩（Jean-Bédel Bokassa, 1921-1996）。⁸⁰

由林志鴻事後專電回報拜會內容，顯示李登輝在謹慎中不忘表露專業觀察分析的能力。李登輝拜會卜卡薩時，首先感謝卜卡薩在政務繁忙時款待球隊。其次稱讚當地球隊表現優秀，欣喜於中非籃球運動的高水準表現，順道邀請卜卡薩派遣籃球隊到遠東地區打交流賽，一併訪問中華民國進行交流，增強雙方國民交流與認識，「將可增進貴我兩國在體育方面之關係」。卜卡薩回應，也為該國球隊在非洲比賽成績優異感到榮耀。李登輝接續稱，相關邀訪球隊事已回報臺北。之後，李登輝提及其以「農村經濟發展見長」，在球隊事務外亦聽取在當地農技團、公路隊報告，稱該國資源豐富，若能妥善開發應用，將來定可在卜卡薩領導下成為一富裕之國家等語。卜卡薩禮貌性邀請李登輝次年以正式官方身分出訪，表達拒絕中共政權建交誘惑之意。李登輝回應，會將卜卡薩由衷言語報告給行政院長蔣經國、總統蔣中正，並將

⁷⁸ 「中非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8月9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1966年1月6日，中非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中華民國與中非共和國於1968年5月6日至1976年8月20日建立雙邊外交關係。1970年卜卡薩曾出訪中華民國，參與雙十國慶日慶典。

⁷⁹ 「中非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8月11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⁸⁰ 「南非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7月26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卜卡薩獲知來訪球隊膳宿不佳時，致贈球隊加菜金25萬中非法郎。林志鴻自稱1967年進入外交部，服務36年後在駐尼日大使任內退休。林志鴻，〈第一次出差的初體驗〉（2011年12月），收錄於「外交部通訊」：https://multilingual.mofa.gov.tw/web/web_utf-8/out/2905/3-1_page.html（2023/03/29點閱）。

努力增進兩國關係。李登輝一行人辭出總統府作結。⁸¹

李登輝稱讚中非經濟建設發展及其未來可能成就，與總統蔣介石在1970年歡迎詞：「讚揚中非共和國在卜卡薩總統卓越領導之下，從事各種建設，獲致輝煌成就」，⁸² 秉持相同基調，顯示服從的一面。李登輝在農經觀察中，展現個人專業經驗觀察以及建議，另從體育方面發展雙邊關係入手，也展現他不拘泥既有外交、經濟資源交流，會從另一層關注交流管道。

李登輝率領裕隆籃球隊出訪期間，也不以長官自居，會以團隊合作角度，與出訪第一線團員同甘苦，以期互相信任。從外館電報顯示，李登輝與球員同食同宿，即可見一斑。他也展露政治判斷準確度，諸如有關獨立慶典參與身分問題。林志鴻大使表達，尚未接到臺北指示，未表達李總領隊官方身分。李登輝即稱：中非既為中華民國友邦國家，不妨告知駐在國政府來者之官方身分，並期盼拜會相關部會首長。林志鴻在收到外交部來電指示同意，即進行安排。⁸³

裕隆籃球隊結束非洲行，回程過境香港，在當地進行一場表演賽。李登輝和南華隊主席周志強到場向球員致意。球隊原訂過境一日，嗣因南華體育會邀請，延長停留期，突破香港方面不批准臺方籃球隊出賽限制。⁸⁴ 這其中李登輝和裕隆主管鄧承先參與處理、協調所表現靈活反應，均功不可沒。在香港親臺系報紙《工商日報》報導中，標註「領隊：李登輝博士」，⁸⁵ 算尊

⁸¹ 「中非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8月20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⁸² 蔣中正，〈對中非共和國總統卜卡薩訪華致歡迎詞〉（1970年10月8日），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卷29演講，頁477。

⁸³ 「中非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74年8月20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⁸⁴ 「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經過報告」（1974年），〈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⁸⁵ 不著撰者，〈裕隆籃球隊抵港 廿六日出戰南華籃球隊〉，《工商日報》，香港，1974年8月24日，版4。香港《工商日報》係1925年7月8日創刊日報，1929年因連年虧損，由富商何東收購。1956年何東病逝，何世禮返港接手報社。報社另有創刊於1930年11月5日之《工商晚

重港英政府治下避免激化中共政權政治氛圍、標榜民間交流意義的事實表述方式。相關事實也呈現李登輝在這些場合中表現柔軟身段，兼具達成使命的意志、行動力兩相結合。這都是李登輝個人風格、行動策略的表現，現存檔案正好協助我們順利捕捉到這些事蹟，得以放入歷史視野分析。

至於李登輝口頭邀訪中非籃球隊來訪臺灣一事，李登輝返臺之初，外交、教育等部門及籃球協會確有協商，曾向李登輝進行報告，唯顯然因球隊出訪經費達新臺幣百萬元以上，教育部僅願負擔球隊在臺食宿，無法承擔交通旅費而告吹。⁸⁶ 加以1976年8月20日，中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再度建交，「體育外交」邀約也無疾而終。

李登輝也正是因為先前已有外交出訪，以及實際操作經驗。等到總統任內出訪時，也勇於在1994年5月4日到16日，訪問中美、非洲四個國家，總共參加哥斯大黎加新任總統、南非共和國新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2013）就職典禮，再到訪史瓦濟蘭，返程路經新加坡專機加油時，再會晤李光耀（1923-2015）、吳作棟（1941-）。劉明修特別指出這一趟長途行程，以推動務實外交為槓桿，擊破外交孤立，以擴大國際社會活動空間為考量。李登輝「意氣風發，令人讚嘆」，「超級外交官」的評價也很高。⁸⁷ 一旦我們理解李登輝在1970年代的出訪經驗，或許也更增進對他1990年代出訪中美洲、南非的思想準備及實際表現，是有底氣的。

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已草簽，香港主權將於1997年移交。何世禮認為香港主權移交後將不利《工商日報》發展，決定於12月1日正式停刊日、晚報。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308-312。

⁸⁶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嚴家淦致外交部、中央社工會、李政務委員登輝函」（1974年10月18日）、「中華民國籃球協會理事長嚴家淦致外交部函」（1974年11月14日），〈裕隆籃球隊訪問非洲〉，《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80809-0045。

⁸⁷ 伊藤潔，《李登輝傳》，頁156。

伍、結語

本文從《李登輝傳》的書寫史觸及李登輝、作者劉明修及其所處時代。劉明修的學術養成背景及其研究關懷，正好是處於臺灣威權時期，以日本治臺時期殖民政策制度史為主題，並注意蒐集海內外史料以進行分析。在當時臺灣史尚未成為專業學科的研究環境下，他參與將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歷史重新「出土」學術趨向，且身為其中一人，其學術實績不容忽視。

劉明修生於臺灣，在日本進修、長居、教學、論議時政。當他在1990年代臺灣政治趨向民主化後，當日本想要理解臺灣相關發展情勢下，他以專業出發，以海外臺灣人關注臺灣歷史為主題，寫作普及歷史書籍《台灣》正好成為前置準備，接續進行《李登輝傳》寫作，呈現臺灣人從「被治者」轉而成為「統治者」下的努力及成果，因此將《李登輝傳》視為作者在自我發現之旅下，書寫同樣經歷自我發現之旅者傳記為海外臺灣人有關臺灣研究的史學成果之一，當屬合理。

劉明修在《李登輝傳》的寫作中，是最先在證據尚未齊備前，即敢於立論指出李登輝與海外臺灣人之間亦有隱而未現人脈聯繫者，這點也啟發後續研究者在掌握更多史料後進行相關探索及研究。劉明修作為李登輝研究的開端者，在相對精簡的書寫中，在文獻蒐集、內容論斷、人際關係觀察，均成為後繼研究者必須參照的基礎。自然，在劉明修寫作時由於部分檔案史料尚未公開，加以關注焦點，或使劉明修未能注意到李登輝在此時開始學習參與外交工作，所帶給他的實際影響，也為他在1990年代親自出訪，推行務實外交路線立下基礎。

作者因能力、學識有限，僅能就兩件案例進行分析，也期望未來在資料更為齊備時，能有後續研究者進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有《李登輝全傳》等類型著作問世。